

新文学旧事丛话

第一章 從中興到宋陵

這年的

在古語中，所以中興的時候，是剛過了中秋。人們都迴響

是。這是所以回來了，子也又回上高想這。他是前那里去了呢？

所以中興的上城，大概早就與高萊的古人說，但這一次却並不

所以也中興的人面心到。也或者，而中興這古上報祠的毛錢子

然而中興老例，只有錢大爺和錢大爺的城隍了。仲子。做

洋兒子，且是教。行從上河以。回中興子也就不錯他二

得，而中興的社會國也說。從中興知道

然而中興的回來，却些是最大不同。中興的中興。

天色出。中興的中興，在古語中，是剛過了中秋。人們都迴響

上海教育出版社

新文学旧事丛话

周庆基 史景树 朱 奕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53176



上海教育出版社

1053176

2057/31

新文学旧事丛话

周庆基 史景树 朱 奕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崇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25 字数113,000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00本

统一书号: 7150·3528 定价: 0.64元

序 言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是关于我国新文学的一本知识性小书。

我国的新文学史，开始于“五四”，到今天已经六十五年。如果要在系统性上着眼，那当然应该写一本新文学史著作。但是，这类著作已经有好几种了，或深或浅、或详或略，读者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读。我们编写这本《丛话》，目的只是为中学的教与学提供有关的知识，希望中学生拿它作为课外辅助读物，中学教师拿它作为备课参考材料。因此，它不能象新文学史著作那样撰写，而必须缩短与中学教学的知识距离。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决定把它写成史事丛话。全书分为三十六个小题，每题用一个事件或作家的一段创作经历为主架，组织成一篇史话。连缀起来，希望略具系统，使读者稍稍能够窥见新文学史的面貌。

文学史上的事件，未必有故事性；某些事情即使本身具有故事性，也未必首尾毕具、引人入胜。何况，有时还要叙出一点历史背景，补明一些前因后果；更何况，有时所写的主要是作家的一段创作过程。这样就不免使故事性有所削弱。如果用阅读小说的要求来读它，那是会失望的。史事丛话毕竟不是小说，我们应当严格按照历史事实落笔。当然，我们之所以采取史事丛话的方式来介绍有关知识，就因为要有一点历史

故事性质，让读者增加一点兴趣。

在题目的安排上，我们想照顾到现行中学语文教材所涉及的新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这样，虽然不免使选题不够匀称，但是可以沟通中学生的课内课外知识。作品分析不是这本小书的任务，因此涉及作品时也只叙述创作过程中的有关故事，至多对此略作评述，读者如能由此增进对于作品的认识，那已经是我们的奢望了。

从目录上就可以看出，这本小书的主要篇幅是放在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的文学上。这是因为，我们想多介绍一些旧事，而当代文学时间还近，大抵是属于近事、新事了。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本书共列二十九题。其中第一题，是从一个侧面来反映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状况的，以便在这个时代背景上开始介绍“五四”前后的文学；第二至第九题，是属于“五四”和二十年代文学的；第一〇至第一九题，是属于“左联”时期文学的；第二〇至第二九题则属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文学。最后七个题目，属于当代。在我国新文学史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在介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的文学时，所列题目大半和这个新的起点相关。

总之，编写这本《丛话》，我们的初衷是：材料的选择兼顾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历史事件的故事性、课内课外的联系性，列题和行文稍具历史过程的系统性，通过这一些来显示它的知识性。但是我们的学识、才力有限，是否能够达到，还是一个问题。希望读者对它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在这里先表示谢意。

编著者

一九八四年仲春

目 录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1)
《呐喊》的来由	(6)
《女神》的降生	(11)
在文学的星座上	(16)
《背影》镜头内外	(22)
《静夜》抒情前后	(27)
《夜》话	(31)
《小说月报》上结出的新成果	(35)
潮音的喜剧	(38)
旗帜和旗手	(42)
“左联”的三大战役	(46)
“夜正长，路也正长……”	(51)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56)
丰收的悲剧	(61)
母亲的赞歌	(65)
“当年海上惊雷雨”	(69)
一首七律传友情	(73)
替奴隶申诉	(78)
为祥子写传	(82)
给华威画像	(87)
边区风景谈	(91)

雾城雷电颂.....	(95)
小二黑在赵树理笔下诞生.....	(99)
他心中有一盏不灭的灯.....	(104)
从“信天游”脱胎的新诗.....	(108)
“指着北斗星前进”.....	(113)
用生命写的诗篇.....	(117)
长篇小说的时代篇章.....	(122)
土地改革的历史画卷.....	(126)
生活的烙印.....	(131)
为新中国报春的诗人.....	(136)
战士的知心人.....	(141)
延河重获新诗情.....	(145)
艺苑始识百合花.....	(150)
采蜜者的采访生活.....	(154)
笔耕者的笔墨情趣.....	(158)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泠水，能否涤愁肠？

这首诗，是鲁迅在一九一二年七月写的《哀范君三章》中的第二首。范君，指范爱农，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知识分子。他远远称不上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仅仅是和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有一些关系罢了。鲁迅写诗哀悼他（后来又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名《范爱农》，收在《朝花夕拾》里），固然有怀念旧友的感情，但更有感伤时事的意思；可说是从革命漩涡的边缘反映了这场革命。

鲁迅和范爱农，都是浙江绍兴人，相识于日本东京。鲁迅先以公费生资格到日本留学，时间在一九〇二年；过了三年，范爱农得到叔父帮助，以自费生资格留学日本。范爱农那时刚从绍兴府中学堂毕业，跟随副校长徐锡麟一起乘海轮到日本，同行的有十三人。鲁迅作为同乡曾到横滨码头欢迎他们，但是徐锡麟和他的夫人王振汉已先在神户上岸，改走陆路了，只有行李留在范爱农他们那里，由他们带到东京。行李照例需经税关检查，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弓鞋是当时缠足女子穿的，外国女子并不缠足，关吏觉得奇怪，便放下公事，拿着弓鞋细看。鲁迅对此很不满：女子

到了外国就要假装大脚，而横滨码头上所迎来的又没有女子，这些男人的衣箱里怎么带这东西来呢？他在旁摇了摇头。范爱农误解了这摇头的意思，以为是看不起他们，就讨厌鲁迅。他在讨厌中记住了鲁迅，而鲁迅呢，毫无所知，而且也没有在那么一些人中认识他。

这时候，正处于反清革命走向高涨的年代。徐锡麟因为没有能够进陆军预备学校，不久就回国了。他以候补道的资历，谋取分发安徽，候补实际职位；终于被任为安徽巡警处会办（副职的长官）兼巡警学堂监督（校长）。一九〇七年七月六日，他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的时机，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率领一些学生起义；失败被捕，当天就遭杀害，还被挖了心。消息传到东京，浙江省籍的留学生集会，吊烈士，骂清政府；有人主打击电报痛斥清政府的凶残，鲁迅也附和这个提议。这时却有人冷冷地说：“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鲁迅问了别人，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徐锡麟的学生范爱农。——他正因为讨厌鲁迅，才冲着鲁迅说怪话。

但范爱农并不知道他此时已受到牵连。清政府从徐锡麟的遗物中发现了范爱农的信件，就把他列入暗中通缉的名单。不久，范爱农的母亲逝世了，叔父停止了对他的资助，他不得不中止东京物理学校的学业，离开日本回国；一到绍兴，就被投入牢狱。幸好绍兴府中学堂的校长把他保释出来，他就在乡下教几个小学生糊口。到一九〇九年，鲁迅也回国了；第二年，鲁迅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教导主任），因偶然的机会碰到范爱农，后来又成了熟朋友，谈起在日本的旧事，解释了误会，才成了相知。

他们渴望已久的革命到来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各地响应；十一月十四日，绍兴的几个旧乡绅也出来宣

布光复。第二天，范爱农就上了城，对鲁迅说：“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这三句话，说了第一句要靠第二句作解释，而第二句又得靠第三句作补充，他的断断续续的说话正表明了他兴奋得急不择言。鲁迅见他“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这种装束是当时知识分子所不肯接受的，而他却戴上了农民帽，可见他的高兴劲儿多大了；“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其实，宣布绍兴光复的几个旧乡绅在这一天所组织的军政府只是投机的产物，仅仅存在几天就因王金发带民军入城而消声匿迹了。

这个王金发，曾与徐锡麟等革命党人一起从事过反清革命运动，但是，如同鲁迅所说，“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①

辛亥革命开初的那些日子里，鲁迅被王金发任命为范师范学校校长，“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②有次他去见王金发，还象革命前在日本留学时一样和他称兄道弟，说：“金发大哥，你做都督哉！”但这位“金发大哥”，已经习惯于被人尊称为王都督了，听到这种哥弟称呼，便皱起了眉头。

王金发刚做绍兴都督的时候，“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乎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③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支持几个旧日的学生办《越铎日

①② 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

③ 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报》，对王金发主持的军政府作种种揭露和评论；报馆收受了王金发的贿赂五百元，却又硬说是“收股本”。这使鲁迅感到难以相处，而军政府又用停发校款相压，故乡成了荆天棘地。这时恰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托人约鲁迅去担任部员。鲁迅对范爱农一说，他很赞成，但显得很凄凉地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鲁迅在辛亥革命后的绍兴住的时间仅只三个月，就看到了这场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一幕悲剧。到南京的时候，临时政府正在与北洋军阀议和。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在北京就任大总统。鲁迅在这年（一九一二年）五月随教育部到了北京。他后来在《朝花夕拾·范爱农》里写道：“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范爱农死于这一年的七月十日，而他在沉水前三月给鲁迅的信里已有“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的话了。

范爱农所说的“如此世界”，在鲁迅的悼诗里有了深刻的、形象的叙述：“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这里的“狐狸”，指清朝的旧官僚。辛亥革命后，清朝被推翻了，这些旧官僚也就离开了他们依附的巢穴；然而就在他们刚刚离开巢穴的时候，新官僚已经登场了。桃指桃梗、偶指土偶人，也就是木偶、土偶（傀儡），新官僚无非是袁世凯手里的傀儡，而袁世凯也无非是帝国主义的傀儡。鲁迅在那时已经看出袁世凯要玩把戏了。在

这种政治环境下，“故里寒云恶”，故乡也处在寒云笼罩之下；“炎天凛夜长”，范爱农仍象在革命前一样被排挤，处境困苦，虽是炎炎夏日也觉得社会冷酷；要为革命出力而不可得，只能感到凛冽、凄冷了。“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清冷的湖水，大约也无法洗涤他的愁肠，所遗留下来的，只是感慨而已。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帝制，它胜利了；但是帝国主义依旧虎视眈眈，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也不曾有丝毫动摇，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失败了。看到袁世凯篡国，又看到张勋复辟，鲁迅对旧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失望。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他不断抄写古书，校订古籍，辑存金石碑帖，这很能表明他处于孤独和苦闷时的心境。他的心头就象被大石压着那样沉重。但是，他的这种抄、校、辑的生活，从另一方面看，也正是在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遗产，由此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坚毅的探索。在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象鲁迅那样的伟大人物，也不得不在沉默中度过他的宝贵的岁月。

正当鲁迅感慨于“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年代，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发生了。沉睡的中国大地蠕蠕欲动。紧接着，中国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新文学发端于这个时候，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土壤上的新产物；它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新的革命浪潮，新的文学浪潮激荡着鲁迅的思想，也激荡着他的同时代的先进人物的思想。

这当然是“独沉清冷水”的范爱农所意想不到的。而鲁迅，则在新文学运动中发出了动人心魄的呐喊。

《呐喊》的来由

北京宣武门外有一条僻静的胡同，名叫南半截胡同，胡同里有一所落寞的小院，那是绍兴会馆。鲁迅随教育部到北京之后，有七、八年时间住在会馆里——因为那时他还没有移家北京。

正当鲁迅在这里寄寓，读古书、抄古碑的时候，北京有几个重要的刊物在倡导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其中之一是《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它在政治上反对帝制复辟，在文化思想上反对尊孔复古和封建礼教。民主和科学，成为它的两大旗帜。刊物由陈独秀主编。发表的文章，尽管很热闹，但是它如同奔驰于毫无边界的沙漠里，不但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编辑者也感到寂寞了。

在这种寂寞中，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想到了鲁迅。钱玄同和鲁迅曾经一起在日本留学，又同时做章太炎的学生（当时章太炎亡命日本，为中国留学生开《说文解字》课，从学的人大都另有专业学习），知道鲁迅曾经热中于文艺，因而到熟悉的绍兴会馆去访问鲁迅，替《新青年》约稿。时间是一九一七年八月。

古树耸立、杂草丛生的绍兴会馆，蚊子很多，夏历六月就大肆活动了。胖胖的钱玄同一到，就把手提大皮夹放在破桌子上，脱下长衫，与鲁迅对坐灯下。他翻着鲁迅那些古碑的抄本，发问道：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鲁迅回答。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明白客人的来意了。现在,该由他发问了;他问的是沉思已久的问题: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于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几个人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钱玄同也运用鲁迅的比喻来回答。

问答里的“铁屋子”,显然是比喻当时的中国。钱玄同说到了希望,鲁迅也认为这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这个新希望,主要是时代提供的。《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化思想革命确然给了他鼓舞。于是,他答应了《新青年》的邀约,提笔写“小说模样的文章”。

正象钱玄同早已了解的那样,鲁迅曾经有过创办文艺刊物而终于失败的经历。他自己,是称之为年青时候的好梦的。他说,“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也有“偏苦于不能全忘却”的梦。这些不能忘却的梦,其实是他从爱国主义出发而几经变换的志愿。十九世纪末,鲁迅的家庭由小康而坠入困顿,他不走应科举考试的道路,而进了洋务学堂,学习所谓新学;这是比较笼统的为祖国人民图富强

的梦。在南京上学的四年中，他从生理学书籍学到的知识，记起了先前父亲的病被专用奇特药引的医生所误，“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这是以医学作为富强之术的梦。他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六年在日本仙台学医，没有毕业就退学了，中止学医的起因，是因为看了一次日俄战争时事幻灯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他又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因此，他回到东京，转入德文学校，为的是留学公费可以仍有着落，而文艺工作也可以进行。他约了许寿裳、周作人、袁文蕤等人筹备创刊文艺杂志，取名《新生》。但是几个原来答应担任文字撰作和翻译的人改变主意，不愿支持了，袁文蕤又转往英国留学，先时承担刊物资金的人也不想垫款了，这样只剩下二周一许，而这三个人都是穷学生，无力创办一个文艺杂志；“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命运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在这个好梦之后，是进入沉寂；沉寂十年之后，又重新扇起了写小说的热情。

就在钱玄同这次访问之后不久，国际上发生了重大事件：俄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炮声响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

曙光开始显露在薄明的天空。马克思主义从此传到了中国，这使中国的知识界开始发生急速的变化。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杂志扩大了阵营，由一人主编变为组成编辑部共同编辑；除了陈独秀之外，还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胡适也参加了。他们的思想状况并不相同，例如胡适就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右翼；但是，《新青年》在继续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中显得虎虎有生气，它在新文化运动中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因素。《新青年》每月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子。在编辑会上，鲁迅特别崇敬李大钊。鲁迅回忆说：“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①

这时，鲁迅除了为《新青年》写随感录外，还在酝酿创作小说。

写什么呢？对此，他当然想得很多。他储存着许多生活素材，也不免浮现出姨表弟阮久荪的身影。此人原来是浙江法政学校的学生，离校后到山西的官厅当职员。他在官场中看到许多丑事：诈骗他人，出卖朋友，害人利己，吮血自肥；他感到“壮士容无地”，长时间抑郁不欢，因而得了一种“迫害狂”的病症。在他的幻觉中常常出现山西繁峙县绅商们撒下的罗网，这个罗网在向他收拢。甚至他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逃到北京以后，还时时惊呼有人在追踪，经常流露出恐怖的神情，发出凄惨的喊声。鲁迅由这位表弟的发狂，还想到，封建势力的舆论代表，曾一再把“疯子”的名目加在封建制度叛逆者的

① 《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

身上。这种种迫害，是精神上的吃人；而他从古代史书上又屡屡看到吃人的记载，就是清末革命者徐锡麟被杀害后也还被挖出心来给炒了吃了。鲁迅把现实和历史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封建社会写满“仁义道德”字样的历史，字缝里隐藏着“吃人”二字；除了肉体上的吃人，还有精神上的吃人，而后者更应该引起注意。于是，他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为《新青年》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警告。这篇小说的题目叫做《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他把“五四”前后所写的十几篇小说集成一个集子，那就是《呐喊》。

鲁迅把他的第一个小说集题作《呐喊》，在自序里是作了解释的。他说：“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呐喊》的来由，远承鲁迅年青时候的好梦。用小说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想头也正是他当年好梦的内容。年青时候的好梦，这时变成了现实，他在用文艺作品为前驱者呐喊助阵了。

当然，相隔十年之后，产生小说的现实土壤不同了，鲁迅观察社会的深度也不同了。“呐喊”的第一声——《狂人日记》就以思想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为中国新文学奠下了第一块基石。这个集子，在新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呐喊》，象号角一样震醒了“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革命前驱者李大钊说：“鲁迅先生是我们《新青年》中最谦虚，最热忱的成员。我们见面不多，但他和我却很能默契。”这位前驱者要求他的子女好好阅读《呐喊》，“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